

沈来秋文集



2002年1月·武汉

沈来秋文集

2002年1月 武汉

沈来秋教授遗著收集编辑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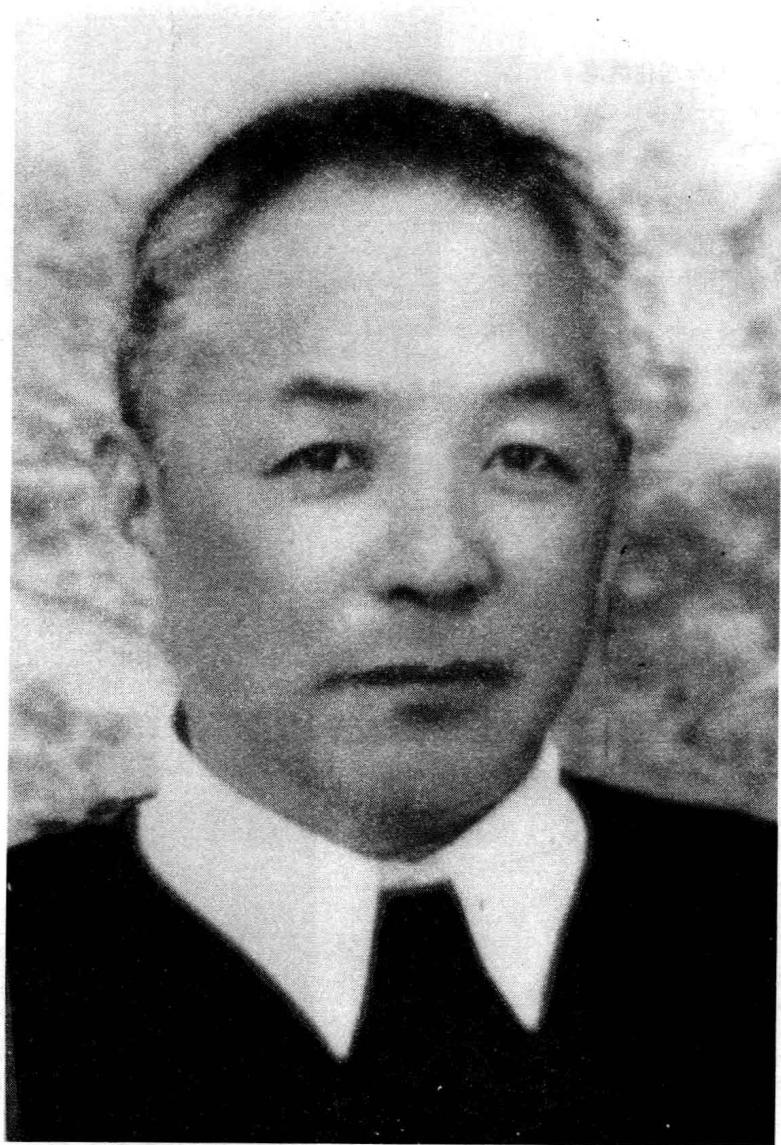
成 员

沈 苏 沈 桂 沈祖庄

沈 织 沈 骏 林 瑞

徐德和 邵洛津 古 鸣

夏 翔 李 欣 许 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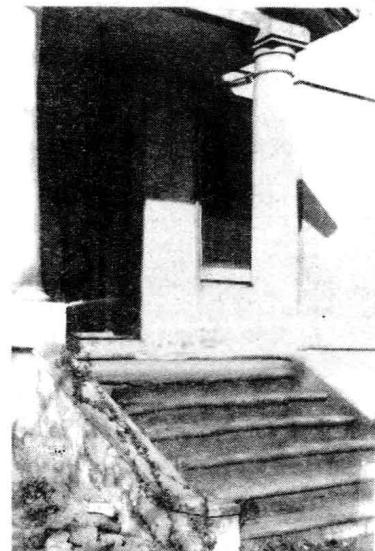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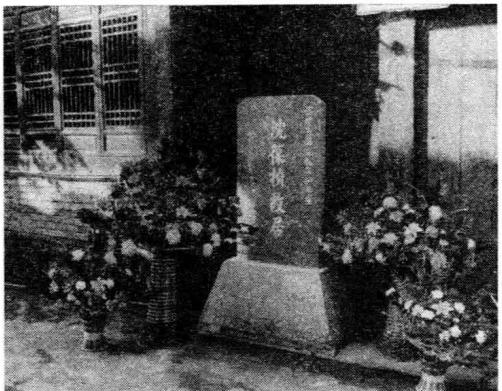


沈来秋教授
(1895—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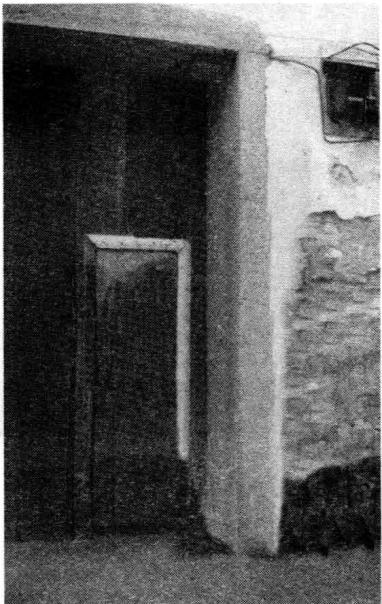
作者诞生与居住之地

作者出生与晚年居住之地
宫巷 26 号——沈葆桢故居

- 上：“沈葆桢故居”大门。
- 中：晚年生活的居室——“莺唤轩”
(“故居”花厅)
- 下左：武昌鼓架坡 17 号——华中大
学教职员宿舍，作者 1946 —
1950 年住处。



下右：福州安民巷 53 号——作者
1929 — 1933 年住处，并在此
救助革命人士。





学习与工作的地方
——同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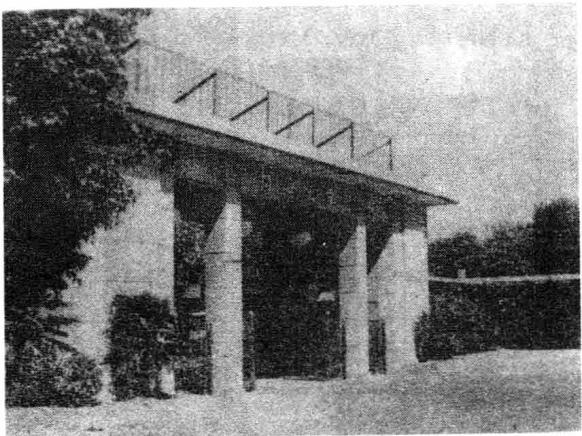
作者 1916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电机专业；
1930 年、1940—1942 年任同济大学教授、教务长、
代理校长。

上：(左起) 同济大学工科创办人贝伦子；同济大
学校址；就读于同济大学时的作者。



中：同济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
的宜宾校址。

下：今日的同济大学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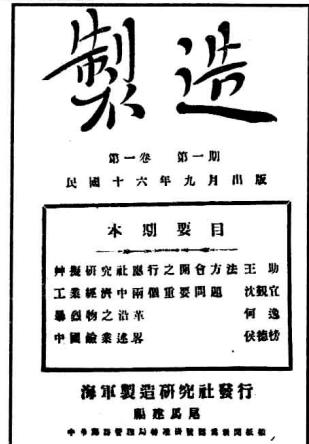
马尾船政局 制造研究社



上：今日马尾造船厂大门

中：作者于 1916—1920 年、1924—1928 年先
后任马尾制造学校教员、马尾船政局造舰少
监、工程师、制机主任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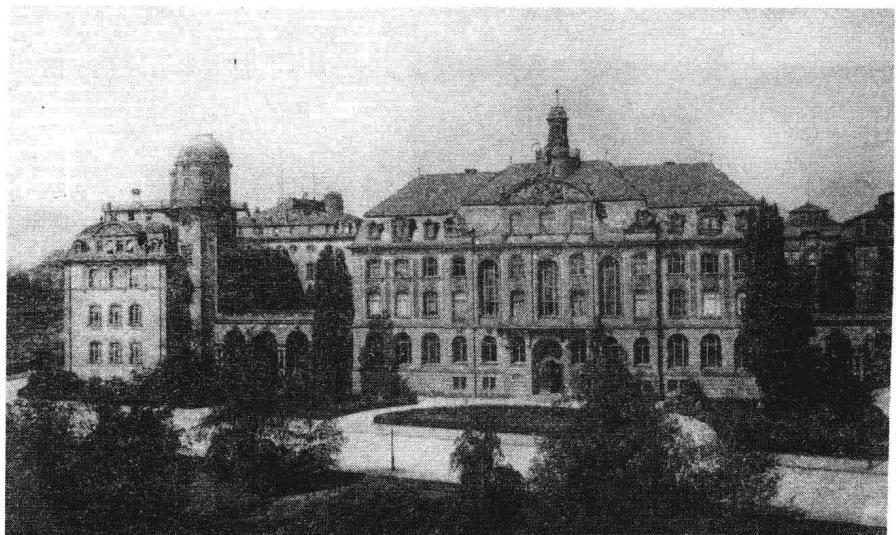
1927 年 5 月与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中国
第一个研究舰艇、飞机制造与工业的研究机构
——制造研究社，发行《制造》杂志。



下：制造研究社成立大会(右一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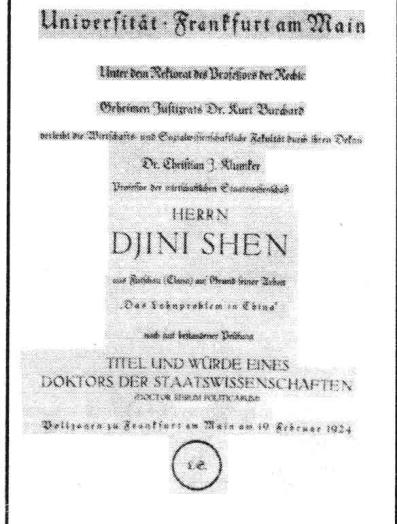
留 学 德 国



法兰克福大学正门摄于 1923 年。

作者的老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保罗·安特博士，他们在共同讨论中国工业化问题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作者于 1924 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图为博士证书。



作者与家人



上：与夫人陈任君女士摄于南京
(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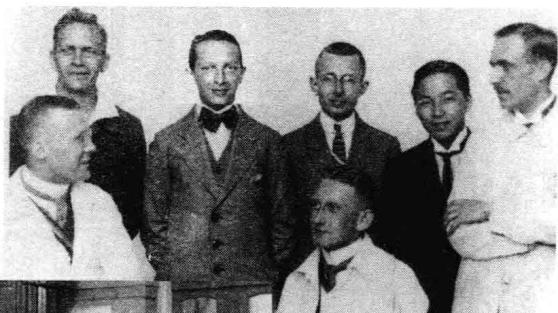
中：与父母兄弟姐妹等摄于福州
(1928年)。

下：与夫人子女等摄于1937年南
京(左)1949年于武汉(右)。



作者与老师、同学、同事和学生

右：1920—1922年就读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1921年5月与该校教授和同学摄于钢铁试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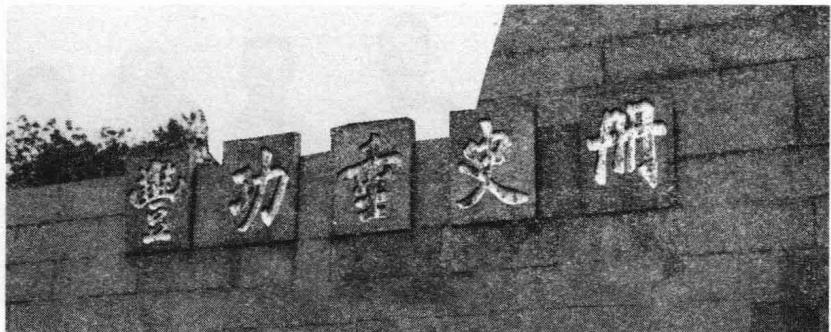


左：与中国同学摄于德国德累斯顿市。

右：与云南大学同事和学生。
下：与华中大学同事和学生。



留有文章在人间



作者与夫人陈任君长眠之地——福州市文林山革命陵园



沈来秋教授诞辰 100 周年(1895—1995)纪念盛会

序

熊性美

沈来秋(觐宜)教授是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

我过去在湖北武昌华中大学经济系做学生时,只知道沈老师早年曾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见多识广、学有专攻的资深教授。读了《沈来秋文集》的文稿以后,才发现沈老师过去的著述涉猎甚广,内容十分丰富。

《文集》的内容是按编年顺序编排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1927 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辑录的文章共 30 余篇。当时沈老师先后在福州船政局等机关任职,在厦门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任教,同时创办了“制造研究社”这一学术团体,以及《制造》、《社会评论》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这时他刚从欧洲留学回国,文章除了针贬时弊外还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应用于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如:论工业建设中的厂址选择和制造成本估算问题;在考察广州、上海等市政组织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市政建设的政策主张;论福建省财政情况,提出官吏廉洁、整顿财政收支的计划;考察国民党政府的公营事业,指出其开支冗费、经营无效率,提出应该将行政管理与经营分开,“以能采取股份公司制度最为有利”等等。还有几篇短论更为具体,即针对福州交通秩序和排水系统的改进建议。

1937 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期间沈老师携全家至后方重庆和昆明并先后在同济大学和云南大学执教。这一时期他著述甚丰,本书辑录的文章共八十多篇,仅 1942 年即达五十篇,大体上包括了四方面内容。首先是对战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分析,关于中国充实国防、加强抗日战争实力的对策建议,特别提出了抗战时国防工业和民生工业一体化的思想;讨论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问题,提出应控制通货

膨胀,呼吁改善公教人员日益微薄的工薪待遇;此外,在抗日战争后期有几篇文章讨论战后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及中国工业化等问题,提出以国家干涉为基础的国营工业同民营工业并存的混合二元经济政策的主张,他还认为中国不应推行计划经济。其次,是珍珠港事件后,发表了不少国际政治军事时评的文章,对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局作形势分析。与此相关,在《新约签订后应如何办》(1943)一文中,提出了战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加强国力是中国与他国保持平等关系的唯一途径。第三,是对不利于抗日战争的行为和社会风气的揭露批评。我认为主要矛头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正在迅速形成的官僚资本的,如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轻信重利、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等等。第四,是从历史及现时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华侨情况的考察研究,指出战后不可忽视提高华侨的地位,中国政府有保护海外侨民的责任。

1946年到1949年期间,沈老师在湖北武昌华中大学执教,收入本文集的作品仅三篇。一篇《委弃农村,谁之过》,批评国民党政府只注意粉饰大城市的表面繁荣,“作为政治斗争的本钱”,“殊不知农村破产乃为今后立国的致命伤”。另一篇《黄金潮》,针对当时恶性通货膨胀,指出一般民众随时随地都在缴纳一种所得税,即承受法币贬值的损失,而拥有黄金美钞的富人则增加赢益。那时,“金圆券”尚未出笼,这篇文章已指出国民党政府要推行“黄金国有政策”了。

解放后,沈来秋教授回到福州在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任教,直到1958年退休。《文集》中没有汇集到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到东北和北京出差,教学及翻译任务繁忙的缘故。《文集》只遴选了六十年代初作者研究福建地理及历史人物如林则徐的几篇史料文章,还有两篇对比今昔、说明退休后生活安适、心情舒畅的文章。但我们知道,沈老师的著述远不止这些,因为沈骏教授所编纂的《莺唤轩剩稿》一书中,还收集了作者退休后所写的若干著述、译文和二十八首(组)诗、词、联,沈骏认为,这些文稿“能够反映父亲的家世、经历、学问和兴趣爱好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沈老师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只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所撰写的题材和内容重点有

较大变化罢了。

综合《沈来秋文集》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具有如下一些显著特点：

第一，博学多闻，题材广泛。《文集》所辑录的一百多篇文章，除了经济方面的理论阐述和解放前各时期的政策时论外，还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科学教育、国际时事乃至人物评论、文学艺术（绘画）等各方面。此外，我们还看到沈老师以文学体裁去针砭时弊、抒发情怀，如《厦门回忆》（1929）、《追忆亡友巴问华》（1930）、《随感》（1940）、《贺新郎：桃花》（1946）等文。如果不是知识渊博、国学功底深厚，断然不能如此。

第二爱国情操。沈老师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集中地体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全家到内地任职执教，忍受生活风霜而夙志弥坚。从《文集》所辑文稿更能看出他时时刻刻关心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尚情操。举例说，1928年他从欧洲回国不久，因日本人经营背景的《闽报》发表言论，意图破坏福州人民抵制日货的反日大会，便挺身而出：“我敢慎重警告《闽报》记者，以后须要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格，勿再作丧心背理的狂言！”（《因反日大会事警告〈闽报〉记者》）抗日战争时期《从辛亥定都说到国防大计》一文指出：“台湾及澎湖诸岛，不但历史上属于吾国，就地理上亦与吾国距离为最近，……吾国争取太平洋地位应以收回台湾为第一步”。1943年元旦展望战争时局时说：“既不宜轻信1943年可以结束战争之预言，更当知道从来民族之复兴，万无侥幸取胜之理。……吾人之力量，尚未充分雄厚，今应积极积蓄，战战兢兢，方克有成”。（《胜利在望中如何捣毁敌寇》）忧国忧民，跃然纸上。

第三，抨击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官僚特权，倡导民主精神。沈老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撰文揭露国民党吏治的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等现象，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集》，可以发现更深层的笔触，如1929年即指出“现在中国的局面是畸形的，没有治法，只有治人，名为民主，实为独裁”（《编后白》），并大声疾呼“现在需要无数勇敢有为的青年前赴后继地向着黑暗堡垒进攻，杀开一条血路！”（《通讯》）又如抗

战胜利前夕，他在参加《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经济问题的呼吁》一文中指出“应该是消灭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铲除贪污的根源”；“替人民说话，是今日念书的人应尽的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能将为广大人民说话的政治态度表白到这一地步，我以为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讲求理论联系实际。《文集》中收集了沈来秋教授论中国工业化、城市市政建设、地方财政状况，公营事业的讨论以及物价和通货膨胀等若干篇重点经济论文，题材相当广泛，时代背景亦不相同，但有一共同特点，即不尚空谈而力求理论联系实际，而所提政策建议亦相当具体。有一些短文，如早期的《南港旅行记》，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坊游记》，名为旅游札记，实际上是根据事实写出的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我是学生，接触社会科学文献不多，但记忆所及，当时所读教本及各式参考文章中奢谈理论、议驳空洞者亦属不少。言之成理的理论文献当然应当受到重视，但我认为昔日沈老师在社会经济论文中强调言之有据的务实学风，今日仍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以上特点不一定概括得准确，但确是我读了文稿结合我和沈老师的亲身接触回忆印证以后才归纳得出的，谨供大家研究参考。

※ ※ ※

解放前后我在华中大学经济系学习近四年直到毕业。沈来秋教授先后教过我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政策两门课，又兼任经济系主任的职务，因此我们之间课外的接触也不算太少。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事不免淡忘，但有些接触还是那么印象深刻，最近有幸读沈老师的文稿，又唤起我一些回忆。

我们师生之间讨论得比较多的，在解放前那段时间主要是货币和物价问题。国民党政权战后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当然是经济学课堂离不开的话题。印象较深的是沈老师讨论时常常要联系货币的职能和纸币流通规律来分析，仿佛在不断提醒学生：讨论实际问题时不要忘记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同时，他曾多次

对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筹措军费表示不满。理论联系实际、诲人不倦，这是沈老师给我的深刻印象。

最初，我作为低年级学生除了上课听讲并偶尔请教一些业务问题外和沈老师并无多少个人接触，但是有一件事却记忆清楚。1947年夏，邻近的武汉大学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枪杀并逮捕无辜学生的“六一惨案”，我的母亲朱君允教授亦遭特务拘捕。过了几天我在华大校园遇到沈老师，他平时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这次却停下来向我询问情况，对国民党当局暴力镇压武大学生表现出极为不满的态度。当我告诉他我的母亲已平安回家，他又说了个人行动要谨慎、回家路上要小心一类告诫话语，表达了师长对自己学生的叮嘱关心。这一次路边谈话明显缩短了我和沈老师之间的距离。我和沈祖庄本是同系同班同学，以后联系逐渐多起来，也认识了在历史系就读的沈梅，我有时去沈家，沈老师和师母总是神情亲切，使我心情放松，不感到拘束。

华中大学学生的课外活动是相当活跃的，如体育、歌咏、话剧、壁报、学术，还有基督教团契以及学生会、同乡会等等。学生社团要活动就需要一定经费，有时不免寻求教师的支持。沈来秋教授是经济系这个大系的系主任，当然是学生寻求财力资助的重点对象。我记得一旦找到他，只要清楚说明来意和估算金额，他总是立刻应承，从无二话。实际上据我了解，沈家人口众多，负担甚重，沈老师能够慷慨解囊，恐怕还要师母的勤俭持家和理解支持。

但是沈老师对校内学生活动也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1947年秋，我参加了一个以文科学生为主的社团，不定期出版一份铅印小报，声明宗旨是要讨论学术问题、报道学校消息。不久历史系一位同学写了一篇长文，有些片面武断，措辞尖锐，而在所报道消息“花絮”中，又涉及个别教师和同学的个人生活。小报四处散发，引起轩然大波。除了校长出面妥善处理外，几天后沈老师也将我和另一同学找去谈话（我们两人是经济系同班同学，又同为该社团的负责人），最后，他神情凝重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大学生，来校求知识也要学会待

人处世，社团写文章发消息要有事实根据，要经过大家讨论同意，岂能由一人随意乱说！（大意如此）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沈老师真正板起面孔。但他的这次谈话使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重要道理：写文章发议论必须有事实依据，做文章和做人是统一的。

解放后沈老师为我们经济系高年级学生开一门课——经济政策。课程的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门新课，经济和政治相结合。当时师生都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学习政治经济学，学生可以提问和发表意见，比过去的课堂气氛活泼。沈老师虽是主讲教授，也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体会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十分虚心，又十分热情。我当时正准备写毕业论文，曾征询沈老师的意见，他建议我做新中国如何进行工业建设的题目，说了一些他的考虑，并鼓励我去武汉三镇做调查，从历史发展中找答案。我当时虽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现在读了《沈来秋文集》中论中国工业化的几篇文章，感到十分亲切，其中关于资金筹措、人才培训、计划制订及政策措施等方面的观点主张，不就是沈老师解放前孜孜追求，解放后对我们学生反复谈论过的吗？我认为，沈老师作为一个爱国并始终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历经生活波折，目睹解放后国家一片新气象，唤起了他振兴中华实现工业化热情和希望，不是很自然的吗？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沈老师昔日为国家设计了相当细致的工业化蓝图，由于缺少最根本的社会制度的保证，始终留存为一片梦想。现在我们的祖国走过了遍布荆棘的原野，找到了改革开放的途径，我们正是在制度创新的前提下，逐步熟悉掌握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规律。我想，中国人民必将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希望，去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这乃是对沈老师最好的纪念。

大学时期的老同学沈祖庄、沈骏兄妹要我为《沈来秋文集》写个序，我感到这是作为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就以读后感及片断的回忆为序。

（熊性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